

以法治呵护公共精神成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现代国家来说,公民的公共精神无疑是国家治理能力中最为能动的要素,需要得到依法培育、保护和发挥。

所谓公共精神,是指个体以作为社会成员的公民立场来参与国家治理的决策、实施和监督的过程,释放自身应有的正能量。换言之,公共精神是一种公民美德,是公民对于公共事务的责任意识在思想和行为上的具体体现,它的作用空间应该是整个公共事务领域。

现代国家治理是一种系统治理,公共精神是这一体系良性运行的“润滑剂”。我国是在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的前提下,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以及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其中,公民的公共精神不仅能够激发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积极性和活力,也能够节约政府治理的成本,提高治理效率,维持和强化治理效果。如果缺乏基本的公共精神,人人追逐自我利益最大化,个体之间相互推脱责任,居民自治就会越界,市场调节就会失灵,社会调节就会失序,政府治理就会失效。

公共精神对危机治理至关重要。古希腊梭伦改革时,颁布了一个奇怪的法令,要求:当城邦陷于危机的时候,任何公民不得置身事外,必须参加到多方争论中的某一方,并努力推动他自己认为正确的方案。这一法令的考虑是:当国家处于危难时,有智慧的人往往倾向于置身事外,明哲保身,所以必须让他们参与其中一方来贡献自己

的智慧,为国家选择一种光明的前途,这是公民不可推卸的公共责任。无独有偶,孔子也论述过公民的公共责任。他认为,一个有智慧、有能力、有途径尽自己一份力量的公民,却不愿意以行动为国家治理分忧,就像是“怀其宝而迷其邦”,违背了儒家“仁”的要义。后来所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讲的就是这个道理。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全国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各种组织的志愿者都自发地纷纷来到四川,以各种力所能及的方式进行救灾,就是公共精神激发出的巨大力量。

日常生活中也需要公共精神。在国内,公共场合抽烟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在车站、饭店、医院,甚至是学校、经常可以看到有人抽烟。尽管这些场所一般都标有“禁止吸烟”的提示,但很多人还是选择性忽略。周边的人也都知道吸二手烟的危害,但对他人

吸烟一般保持沉默,不好意思劝阻。培育公共精神首先要唤醒自身的责任,从自己做起,发挥好每一个公民的作用,“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其次,是要营造一个引导、鼓励和保护公共精神的同时,要更加注重的行为被追责,将其法律责任落在实处。唯其如此,政府官员才会把夙夜在公、忧国奉公作为最基本的公共精神,普通公民才会践行奉公守法、克己为公的公共精神,全社会才会形成天下为公、和衷共济的公共精神。

韩春晖

治理欠薪不能单打独斗

每到年关,欠薪总会成为一个令人揪心的话题。与往年不同,经过这些年的严厉整治,尤其是司法机关高擎刑利剑,2013年并未发生多少欠薪讨薪的极端个案。但与此同时,那些游离于刑罚标准之外的一般性违法欠薪,那些并不一定会酿成重大影响的欠薪,则可能成为今后执法面对的突出问题。

近日,人社部劳动监察局局长闫宝卿透露,虽然欠薪案件涉及人数有所下降,但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在一些行业还有发生,集中在工程建设领域,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餐饮服务等行业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拖欠工资明显增多。从其披露的数据信息看,欠薪案件数量仍然处于高位,且呈现一些新特点,如拖欠工资问题与拖欠工程款等经济纠纷交织在一起。

这说明,在转型时期,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走向,欠薪并非短期内的个别现象,而是一种需要长期治理的法律问题。以往我们治理的主要逻辑是,欠薪纠纷出现乃至恶化之后,为避免出现矛盾激化而进行事后处罚和救济,倚重刑罚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在刑罚威慑之下,恶性案件大量减少,但是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欠薪现象,却不能完全依靠刑罚得到根治。

对于欠薪行为,我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刑法修正案以及相关司

法解释都有明确规定,这为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介入此类纠纷提供了充分依据。这意味着对欠薪的治理,不能靠哪一个部门单打独斗,甚至未来主要也不是依靠定罪处罚;相反,应当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针对欠薪行为进行类型化处理:对于主观恶意欠薪且影响严重的行为,依照刑法进行严格的刑罚追究;针对构成行政违法的欠薪案件,需要劳动执法部门严密执法;而对于普通的欠薪纠纷,则需要发挥劳动仲裁的程序功能,并将此类纠纷纳入便捷的民事司法救济渠道。

从根本上说,无论是行政处罚还是刑事处罚,公权力的介入对于维护作为弱者的劳动者权益不可或缺,其执法的耐力是形成规范化秩序的关键,但同时也要看到,这种公权力执法总会呈现出难以避免的局限性。因为与海量的用工市场相比,公权力无法对用人单位进行全天候监控,对日益变换的欠薪纠纷现象的治理难度力不从心。因此,在期待行政执法更有积极作为的同时,我们还应当从契约法治的理念着手,为劳动者维权提供更加公平的平台,尤其是在劳动者维权的自组织能力 and 法律意识方面,下更多实质性的功夫,以改变劳动者弱势的地位。而只有实现劳动者力量的崛起,才能最终与用人单位的均衡博弈,最终从根本上解决公权力代罚为讨薪的难题。

傅达林

在北京,民政部和最高检的职工时常会为一件事苦恼:民政部员工的信件被送到了最高检,最高检员工的信件被送到了民政部。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原因很简单,不在同一个大院的两家单位一直共用“东城区北河沿大街147号”的门牌。这是各地路标门牌信息混乱的一个缩影。(1月6日《人民日报》)

路标门牌“对头”要与时俱进

跟着路标走不对路,循着门牌找不到门,路标门牌着实有点乱。每个城市或多或少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显而易见,这是城市快速发展带来的问题。

城市在变化,城市版图在拉大,交通拥堵倒逼之下,道路的飞速扩张甚至一天一个样。很多市民对自己生活的城市隔段时间就要重新梳理一下认识,因为一些新修的道路、桥梁、隧道都不熟悉了,这样变化的节奏确实让人惊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随之而来的新问题可以被无视、被慢待,诸如路标门牌科学设置与管理的问题。

路标门牌的设置与管理,跟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息息相关。它本是帮助人们工作生活更加方便的辨识工具,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却给人们造成了不少困扰。路标门牌信息混乱,不仅影响到众多行业信息系统建设,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而且给群众日常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多数人曾经历“寻路难”。在错误信息的引导下,在一条路上来来回回地走,睁大眼睛地寻找,就是找不到自己想去的地方。

根据媒体调查,造成路标门牌信息混乱的原因错综复杂。既有历史原因,很多建筑物没有纳入管理范围,又有城市扩建因素,新延伸路段“抛弃”老路名;既有政府多头管理、监管困难的尴尬处境,又有临时建筑管理依据尚属空白的无奈叹息。虽然原因多种多样,但是这一问题却不能不解决,也不能解决不好。因为这是典型的民生问题,无论大小,都要着眼为民、便民、利民,都要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想解决好路标门牌“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恐怕要投入不少的人力物力、财力精力,可能换来的只是人们走对路、找对门“情理之中”的一句话,但是,这样一句话对我们的社会管理者而言就是最高的评价。路标门牌“对头”,不仅方便本地居民,更重要的是大大方便了外来人员,所以说,它还是城市形象的代表。一座城市是否管理有序、治理到位、以人为本,从路标门牌上也可一斑。因此,解决好路标门牌信息混乱问题,应尽快提上各级政府日程,不要再让人们在本该熟悉的城市中迷失了。

宋华

2013年12月5日早晨,在云南省昭通市绥江县县委县政府综合楼门口,记者看到一个背着背篓的男工人和一个戴着花巾的妇女,走进办公楼一楼,直接进了电梯,没人盘问或让他们出示证件。在绥江县,全县所有党政机关都没有围墙,人们到机关办事不会被询问,也不需要登记就可以走进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任何一名干部的办公室。(1月5日《中国青年报》)

机关拆围墙是权力谦卑化的象征

机关俗称“衙门”,有高大的围墙一直是权力身份的象征。同时,在现实之中,高墙还承载了维护安全、保障机关秩序的重要功能。故虽有一墙之隔,但权力与权利之间却千差万别,泾渭分明。权利者进入政府机构表达诉求,其实就是一个“翻墙”的过程,而很多人,根本没有机会进入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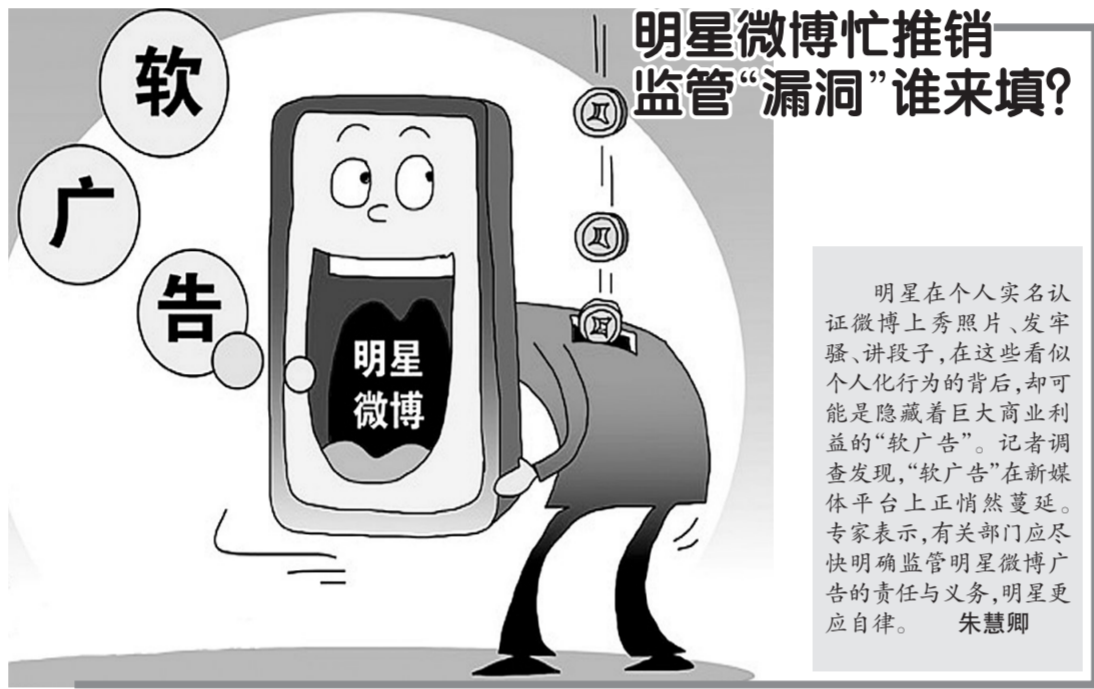
几年前,湖北省政法委综治维稳办某领导的妻子陈玉莲,到湖北省委机关办事,在门口打手机给政法委领导时,突然遭到6名从省委大院冲出的男子一拳拳打脚踢。苏北某县政府一名门卫则称,他曾因为放进上访户,险些丢掉饭碗。

有时候,权利和权力就只是一墙之隔。若是连“门难进”都无以解决,更遑论解决“脸难看,事难办”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机关拆围墙是权力谦卑化的第一步,也是权利获得尊重的基础。若连形式上的“高墙”都无以拆除,则“心墙”也无以消解。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县委为防止上访群众堵门,曾一度在办公楼的每一层走廊口设了一道大铁门,还在大院外建了一道围墙,群众找县领导得先闯“四道门”,2006年8月,崇阳县县委、县政府做出决定:推掉围墙建广场,一年后全县受理群众来信来访量比上年下降了53%。

或许,正如有论者所言,不应神话拆除机关围墙的作用,但也不能因此而拒绝实施。效果不是决定这种行为的优先原则,因为这更关乎权力伦理与权利尊严,更关系到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递进。哪怕目前这仅是形式上的进步,但若连形式之限都无以突破,更无法构建“开放式”的新格局。权力依然端坐高墙之内,所谓的“心墙”破解也就只是空话。一墙之变还有理念的变化,因为这终将由堵向疏转变。之前,有了围墙的庇护,权力者还可以有侥幸心理,但围墙一破则会让权利者畅通无阻,若不能将矛盾化解在基层,若没有一种正常的解决渠道,围墙之拆就会让权力者焦头烂额。故而,拆除围墙需要自信,更需要对权力责任的清醒认知。从这一点来说,拆除围墙的最大意义在于,权力者打消了心中的顾虑,这有助于拆除存续已久的“心墙”。

总之,机关拆围墙是权力谦卑化的象征,其标志性的意义不可低估。

唐伟



明星在个人实名认证微博上秀照片、发牢骚、讲段子,在这些看似个人行为背后,却可能是隐藏着巨大商业利益的“软广告”。记者调查发现,“软广告”在自媒体平台正悄然蔓延。专家表示,有关部门应尽快明确监管明星微博广告的责任与义务,明星更应自律。

朱慧明

用底线拯救大学课堂

据《光明日报》报道,日前,浙江大学公布设立一笔教学促进津贴,第一年预算资金2000万元,专门用于额外奖励用心上课的教师。根据校方对2013学年教学工作的估算,首批大约将有500位教师拿到总额近800万元的奖金。

请看今日大学课堂之现状:北大成立起床协会,发起团结起床困难户为吃早饭打早卡而奋斗;四川大学工商管理系发起“Morning Call”活动,男女同学一对一结对,互相打电话起床签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食堂推出“励志早餐”,每天前20名走进南航大明故宫校区食堂签到吃早餐的同学,将会获得“早起鼓励蛋+粥”一份;哈尔滨部分高校“代课”经济日趋火爆,代课上120分钟价格20至40元;一款手机“代课软件”在南京高校流行,这款逃课神器已经覆盖了全国3000多所高校……我们的大学课堂已经涣散,无序到什么程度?这种逃亡式的流失正在成为中国大学课堂的常态,称之为触目惊心算是危言耸听吗?

怎么办?浙江大学设立教学促进津贴的做法及时而又得当。学生与教师比起来,当然流失的主要原因在教师。大学教师的天职是什么?科研要和教学比起来,教学第一科研第二是不容置疑的。道理很简单,因为教授是教书的,不教书的学者、专家应当驰骋活跃在科学院、研究所、研究院。在那里,你的天职是研究,你的职称就不是教授而是研究员。

现在的大学多少事情颠倒了,教授和助教多少人都不教本科生,多少没当上教授者哪有心思在教书上,学生上课能不流失吗?有多少人是在凭着“用心上课”而在大学讲台站稳脚跟的?大学的方向跑偏了,大学的学术异化了,学生能不逃课吗?说到底,教师的问题在领导。浙江大学在深入了解课堂现状的基础上,决定在教师“用心上课”这一最起码最基本的原则上划定底线,看似简单,其实是清醒了教育的根本,它拯救的不仅是课堂,而是大学正常发展的方向。

魏润身

有福不可享尽

在一些家庭,智慧会劝子孙“有福不可享尽”,过得去就行。但人们对这个道理的醒悟,往往是在见事乃至经事之后。至于力行者,则更不知有几。

正所谓“月满则亏,水满则溢”,世人情亦有盛极必衰,否极泰来之理。遍翻史册,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代若二代富,三代吃花酒,四代穿破裤,五代宿街头”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有人曾对清代“同治中兴”将帅的后裔作过调查,结果发现,大多数家庭从儿孙一辈起便坐享其福,到了孙辈曾孙辈,吃喝嫖赌、游手好闲几成通病,以至潦倒沦落,家业隳颓。

“奢靡之始,危亡之渐”。过度享乐之害,就在于使人意志消沉、信念动摇,情趣低落、玩物丧志,在享尽其福中往往把自己玩完。晋王季羣即即位之初,负负驱驱,南征北战,建立了后唐。其后却骄于骠,逸于居安,忘稼穡之艰难,侈色禽之荒乐,以至“身死国灭,天下笑”。跨越了享福的合理界限,走上了享乐的歧路,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的转变就会如此迅疾。

然而,对于一些领导干部来说,虽然懂得过度享

乐之害,却往往身在福中而不知其福已多。有的人要官比谁都亢奋,争待遇比谁都计较,比享受比谁都内行,“为儿女谋钱财”比谁都积极。有的奉行“花自常开,月自常圆”,觉得自己什么都能搞定,根本不思考为了谁、我是谁。有的奉行“当官是暂时的,做人是永久的”,有权就要用到极致,根本不顾忌物议纷纷。有的奉行“人生得意须尽欢”,刚提拔就要换房、换车,晚一天,差一平方米都不行,根本不考虑谦抑退让。

现在条件过去好了,要求都去过清教徒、苦行僧般的生活,也是走极端。但是,如果眼里只有个人利益,过分在乎帽子、票子、房子、车子、位子,那就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内心有“福不可享尽”的自警自省,懂得节制欲望,方能在金钱面前不动心,在声色面前收心,在权力面前敬畏,在荣誉面前清醒。

有俗言“福受尽缘必孤”,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这个“缘”,就是人心。享乐主义盛行,奢靡之风盛刮,只会招来群众冷眼、白眼,最终失去人心。没有人会信任和支持这样的干部。

闻君

提升文化软实力是项艰巨任务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重要的软实力。去年来政治局举行的最后一次集体学习,聚焦文化软实力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的确,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的大众的,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辐射力,是我们时代的大课题和历史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从四个方面阐释了如何提高文化软实力,一是从思想道德、社会风气、每个人抓起,夯实文化根基,二是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三是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四是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这四个正是发展中国文化的意义,提升文化影响力的关键所在。从宽泛的意义来说,文化几乎无所不包。但任何一种文化,任何时代的文化,都有基本的价值导向。价值观

是文化的灵魂,它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任何政党、社会组织、社会群体都是靠着某种共同的价值观凝聚起来的。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必然有一个起主导和统领作用的核心价值体系。这是一定的国家制度、社会制度的精神支柱,也是一定的社会系统得以运转、一定的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思想基础。

中国要建设文化强国,首先必须解决价值观的重建问题,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无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定位于什么,鉴于中国是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里,必须包含民主、科学、自由、效率、平等、责任和竞争等反映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因子。

每种经济和社会制度都需要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当一种文化价值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体现这种价值取向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就比较容易建立起来,人们在维护这种经

济和社会制度时就不会不遗余力。相反,如果一种经济和社会制度在人们的文化评价中失去了合理性,这种制度早晚会被抛弃。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和发展,直接得益于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的传播。像好莱坞的文化产业对宣扬美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就起到了重要作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要赢得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同样需要文化价值观的支持。

客观地说,改革开放以来,在文化建设上,我们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尤其是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汉语热以及孔子学院的建立,反映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开始在世界发挥影响力。尽管如此,同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相比,文化的影响要弱很多。因此,要提高中国文化的辐射和影响力,必须站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根据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满足群众对高水

平文化的需求,这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

在这方面,目前的问题仍然是计划体制与市场方式的矛盾,经济体制改革与文化体制改革的不平衡、不协调,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要求我们改革文化体制,发展文化生产力。文化的市场改革是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鉴于文化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我们对文化的管制有些过严,这不利于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不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播。

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发展和繁荣,就应克服单纯地、孤立地抓经济建设的片面的发展观,充分认识文化作为软实力、软规范的重要战略地位,以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创造良好的经济、政治、社会条件。只有在文化上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化才能发展和繁荣,并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邓聿文